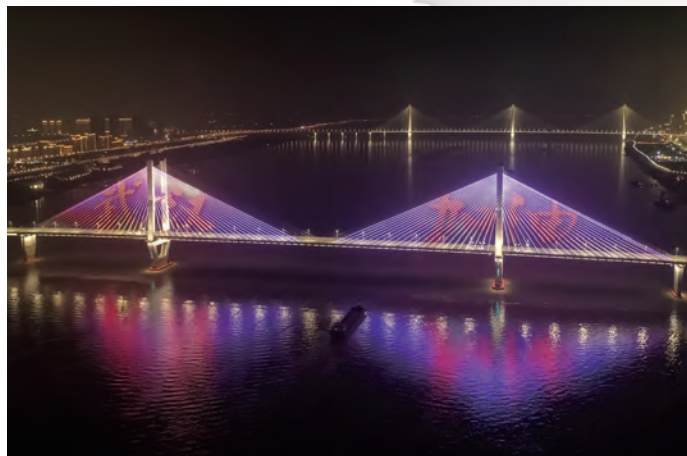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湖北省秭归县拍摄的秭归长江大桥。



1月31日，武汉长江二桥打出“武汉加油”字样（无人机照片）。

“国近代工程之父”仍没能见到武汉长江大桥动工的那一天。在詹天佑病故的同一年，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写道，要通过桥梁或者隧道，将武昌、汉阳、汉口连成一座大武汉。在孙中山眼中，当时的汉阳有中国最大的铁厂，汉口亦多新式工业，武昌则有大纱厂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、西部贸易中心，特别是茶叶大市场。“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，必须定一规模，略如纽约、伦敦之大。”

然而，此后数十年，无论是武汉还是长江上的其他城市，都没有修造跨江大桥的动静。积贫积弱的中国，一时间面临亡国灭种之忧。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日军疯狂的进攻，甚至不惜自沉仅有的几艘军舰于长江。造桥计划？除了战事未启或者暂缓的1930年、1935年，曾有国民党政府请来的美国或者苏联专家探看一下，零星提起外，总起来说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唯有在中华民族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后，长江大桥建设才能进入议事日程。1950年初，中央人民政府指示当时的铁道部着手筹备武汉长江大桥建设，成立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。筹建工作持续了五年。这五年，中国从百废待兴中走出——经历了抗美援朝，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2014年去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方秦汉曾参与过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施工。他生前回忆称：“当时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修建武汉长江大桥，召集了最优秀的专家，调动了全国最先进的设备。”且看当年的专家名单——1955年成立的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，主任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，委员有桥梁建筑专家罗英、土木工程专家陶述曾、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李国豪、结构力学和工程教育专家张维、建筑学家梁思成等。可以说，

当年国内数得出来的与造桥有关的专家，一一在列。当时的铁道部还从苏联请来了康斯坦丁·谢尔盖耶维奇·西林等28人组成的专家组。西林给出的武汉长江大桥施工方式——大型管柱钻孔法，在当时的世界桥梁建设领域都属于新创。将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面，并在岩面上钻孔，在孔内灌注混凝土，使其牢牢插结在岩石内，然后在上面修筑承台及墩身——这样的办法，保证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坚固耐用。

2018年12月16日南京长江大桥通车50周年纪念跑鸣枪开跑。

